

DOI:10.13527/j.cnki.educ.sci.china.2023.01.013

寻找把教育学托上天空的彩云 ——评侯怀银教授的《20世纪中国教育学史》

孙 杰

“寻找把教育学托上天空的彩云”是恩师王炳照先生在22年前《写在陈元晖先生〈中国教育学史遗稿〉出版之前》一文的主标题，现作为这篇书评的主标题，是想表达两个方面的情结。一是对“中国教育学史”研究的情结。正如王炳照先生将自己的文集同样定名为《寻找把教育学托上天空的彩云》（“中国当代教育论丛”之一，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时所言：“将文集定名为《寻找把教育学托上天空的彩云》，实际上是我的老师陈元晖先生的一贯追求，我之所以借来作文集的名字，主要是想说明我所做的事只是将老先生的事业继承、继续下来，同时，也希望能薪火相承，青年学者能将教育史学科发扬光大。”^①文中所提到的“陈元晖先生的一贯追求”，就是陈先生在生前计划写一部《中国教育学史》。他说：教育学要提高不能单靠借鉴外国人，要善于总结自己的优秀遗产，教育学也不只是西方人搞的一种模式。写《中国教育学史》不仅可以提高我国教育学的学术科学水平，而且具有世界意义，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认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②他还写道：“我以前主编过《中国教育思想通史》，有了这个积累，我对撰写《中国教育学史》还是有了一点底气。”^③遗憾的是，陈元晖先生仅撰写完成了“一头一尾”的《中国教育学史遗稿》。鉴于此，笔者拜读了侯怀银撰写的《20世纪中国教育学史》，感慨良多，想到了师门的一贯追求以及未竟之业。二是对“20世纪中国教育学史”研究的情结。笔者攻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就曾拜读过侯怀银的博士论文《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史发展问题的反思》，在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也曾多次听到王炳照先生谈到与“中国教育学史”研究相关的话题，又因自己是山西人，故交谈内容时曾提及侯怀银的相关学术研究。再加上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同样关注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内容，且毕业之后有幸来到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工作，无形之中在师门的一贯追求与侯怀银的相关学术研究之间搭建了沟通的桥梁，实现了方向的融洽。特别是得益于侯怀银亦师亦友的关怀和指导，自己既坚定了秉承师门之一贯追求的学术志向，又加深了对于侯怀银相关学术研究，尤其是对于“20世纪中国教育学史”研究的学术兴趣。或许这正是自己深读《20世纪中国教育学史》而斗胆写出自己浅显读书心得的因缘所在。至于题目中用“评”字，事实上是对写作表达方式的遵从，而非自己的写作能达此水平和程度，恳请诸位读者多多批评指正。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四五”规划教育学重大课题“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发展与创新研究”（VAA210003）。

作者简介：孙杰，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

①③ 王炳照. 寻找将教育学托上天空的彩云 [J]. 教育学报, 2010 (6): 8-9, 10.

② 陈元晖. 中国教育学史遗稿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2.

一、《20世纪中国教育学史》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概念

侯怀银在《20世纪中国教育学史》一书中，提出了“20世纪中国教育学史”这一新的概念，标志着“中国教育学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第一，“20世纪中国教育学史”这一新概念的提出，是侯怀银对自己已有研究成果的概括和提升。作者指出，“20多年来，笔者一直把中国教育学史作为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心，乐此不疲，费尽心力”，其间共完成了五个方面的基础性工作。“其一，完成了‘中国教育学科体系发展史’（1949—2000年）的研究任务。”“其二，进行了博士论文《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学发展问题的反思》的写作。”“其三，主持并完成了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20世纪中国教育学发展问题研究’、山西省教育厅中青年拔尖创新人才支持计划项目‘中国教育学发展问题研究’。”“其四，承担并完成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西方教育学在20世纪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其五，以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项目为平台，完成了‘20世纪中国教育学史’的研究工作。”^①由此可见，《20世纪中国教育学史》一书正是作者既往研究成果的持续推进和系统提升。

第二，“20世纪中国教育学史”这一新概念的提出，是侯怀银对20世纪中国教育学相关学术研究成果的概括和提升。《20世纪中国教育学史》一书最为明显的特色之一，就是对20世纪以来中国教育学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总结和概括。这一方面为作者划分中国教育学百年发展历程和总结中国教育学百年发展历程的阶段特征，提供了丰富的教育学方面的史料支撑；另一方面在阶段性呈现中国教育学的代表性著述的过程中，让读者能清晰地感受“20世纪中国教育学史”这一新概念的动态生成，从而让一个较为抽象的概念具有鲜活的生命特征和鲜明的个性特点，进而让史料走进读者的阅读视野，真正在研究中达成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第三，“20世纪中国教育学史”这一新概念的提出，是侯怀银对当今学术界教育学史研究成果的概括和提升。从陈元晖先生的《中国教育学史遗稿》到王坤庆的《教育学史论纲》再到侯怀银的《20世纪中国教育学史》，大体上反映了中国教育学史研究的总体发展历程。如果说陈元晖提出了“中国教育学史”的概念、王坤庆提出了“教育学史”的概念（偏重西方教育学史），那么侯怀银则明确阐释了“20世纪中国教育学史”这一新概念。再进一步比较的话，《中国教育学史遗稿》的研究主旨是“总结自己的优秀遗产”“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认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②。《教育学史论纲》的研究，一方面接续了《中国教育学史遗稿》的未竟之业。“我国已故著名教育理论家陈元晖先生在《中国教育七十年》一文中指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一本‘教育学史’方面的专著。本书是笔者尝试研究教育学史而撰写的一部学术专著。”^③另一方面，则是“以西方教育学史为依托，侧重以史论结合的方式去讨论相关问题，不求体系的完整，只求对相关问题作历史和现实的考察，并结合分析中国教育学的现状，试探中国教育学的发展道路”^④。《20世纪中国教育学史》与《教育学史论纲》称得上是“同宗同源”，皆受益于叶澜先生。王坤庆指出，1994—1997年受华东师范大学叶澜之邀，他承担了她所主持的“八五”国家级重点科研课题“教育学科的体系与发展研究”之子课题“20世纪西方教育学科发展研究”，就20世纪西方教育学科发展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写成《20世纪西方教育学科的发展与反思》书稿。经过近十年的探索与思索，他觉得有必要将自己在“教

① 侯怀银. 20世纪中国教育学史 [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前言 7-8.

② 陈元晖. 中国教育学史遗稿 [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2.

③④ 王坤庆. 教育学史论纲 [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前言 1，前言 3.

育学史”方面的思考公之于众，以求同仁的指教与点拨。^①侯怀银谈到，1993年笔者在做华东师范大学叶澜老师的访问学者期间，参与了她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课题“教育学科体系的建设和发展研究”的研究工作，并承担了子课题“中国教育学科体系发展史”1949年以后部分的研究任务，由此开始了对中国教育学史的研究工作，至今已有20多年。^②一西一中，共同指向一个明确的主题——“教育学史”，这也造就了两本书之间的“共旨异趣”。所以，《20世纪中国教育学史》研究之目的就在于，以“20世纪中国教育学史”为切入点，全面展现中国教育学者在20世纪的辛勤劳动，全面总结20世纪中国教育学的遗产，倡导合理继承20世纪中国教育学传统。站在学术接力传承的立场来看，从陈元晖先生“总结自己的优秀遗产”到侯怀银“全面总结20世纪中国教育学的遗产”，在进一步精确研究范围的同时，更加凸显了“20世纪中国教育学史”这一新概念的思想内涵，即通过回顾与反思20世纪中国教育学发展的历程、成就与经验，构建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教育学。

二、《20世纪中国教育学史》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侯怀银在《20世纪中国教育学史》一书中，从对中国教育学百年发展历程的梳理过程中，围绕“发生—初建—重建—挫折—再建”五个核心关键词，系统地构建出了“20世纪中国教育学史”的学术体系，体现了中国教育学者对于中国教育学科自身发展的学术自觉和责任担当。

第一，“20世纪中国教育学史”的学术体系，蕴含在彼此相互连接且又各具特色的五个发展阶段之中。《20世纪中国教育学史》以国人编写的教育学著作和教材为基本载体，立足中国教育学者对中国教育学的建设层次和水平，把20世纪中国教育学发展历程划分为五个阶段：中国教育学的发生（1901—1927年）、中国教育学的初建（1927—1949年）、中国教育学的重建（1949—1966年）、中国教育学的挫折（1966—1976年）、中国教育学的再建（1976—2000年），其主旨就在于“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变革的实际需要与教育学自身发展的交互作用为基本线索，对20世纪中国教育学史进行研究，力求绘就一幅较之前人更为清晰、更为全面的历史画面”^③。这就是立足具体阶段而着眼构建“20世纪中国教育学史”学术体系的“分—总”布局，以期在读者眼前呈现出一幅局部特色鲜明、整体主旨突出的历史画面，这个历史画面正是“20世纪中国教育学史”的学术体系。

第二，“20世纪中国教育学史”的学术体系，贯穿于20世纪中国教育学发展大事记的关键节点之中。《20世纪中国教育学史》主要根据《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陈学恂主编）、《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2卷上册）、《中华书局图书总目》《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教育·体育》（北京图书馆编）、《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日]实藤惠秀监修，谭汝谦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国教育学发展问题研究——以20世纪上半叶为中心》（侯怀银著）、《20世纪中国教育学发展问题研究》（侯怀银著）以及《中国教育年鉴》《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教育研究》《课程·教材·教法》《外国教育动态》（现《比较教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教育研究与实验》等相关教育资源，以十年为界限，编制了20世纪中国教育学发展大事记。大事记以“1901年5月，罗振玉、王国维在上海发起创办中国近代第一份教育专业期刊——《教育世界》”为起点，以“2000年11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分会教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第六届年会，对‘教育社

^① 王坤庆. 教育学史论纲 [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前言 3.

^{②③} 侯怀银. 20世纪中国教育学史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20: 前言 7, 前言 5.

会学本土化与国际化’‘世纪之交教育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改变’等问题的研讨”为终点，以点带面，多层次、多维度、时空交错、立体交叉地呈现 20 世纪中国教育史发展的重要历史节点及标志性事件，从而以记事的形式描绘出“20 世纪中国教育史”的学术体系。

第三，“20 世纪中国教育史”的学术体系，体现在 20 世纪国人引进和编写的教育学著作和教材的不同门类及整体结构之中。《20 世纪中国教育史》主要根据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资料中心等藏书，分别编制出 20 世纪中国引进的教育学著作和教材索引，以及 20 世纪国人编写的教育学著作和教材索引等两种类型的索引资料。其中，20 世纪中国引进的教育学著作和教材索引，将各种相关教育资料分为 44 个学科门类，以期分门别类地呈现各国教育学著作和教材在中国的引进情况。事实上，就以各国作者和书名为标志，描绘出了以“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学”为根基的教育学著作和教材之树。以教育学著作和教材之树为背景，就是“20 世纪中国教育史”之学术体系的一类侧面印象，即“教育学在 20 世纪中国的发展史”。20 世纪国人编写的教育学著作和教材索引，同样是以“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学”为根基，从 70 个学科门类呈现各种类型的教育学著作和教材。与前者不同的是，《20 世纪中国教育史》正是以国人编写的教育学著作和教材为基本载体，立足中国教育史研究者对中国教育学的建设层次和水平，把 20 世纪中国教育史发展历程划分为五个阶段，而这五个阶段正是对“20 世纪中国教育史”的学术体系的全面体现，这就是作者所强调的要以“20 世纪中国教育史的发展史”作为重点路径来展开 20 世纪中国教育史研究。以上两条路径的合并，既是作者编制教育学著作和教材索引的动因所在，又是作者进一步突出自己的研究主旨，并全面呈现“20 世纪中国教育史”的学术体系的目的体现。

三、《20 世纪中国教育史》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命题

侯怀银在《20 世纪中国教育史》一书中，结合对“20 世纪中国教育史”概念与学术体系的探讨，形成了关于“20 世纪中国教育史”的一系列命题，从而为新时代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寻找到有力的支撑点。

第一，在中国教育史的发生阶段（1901—1927 年），中国教育学呈现适应性、外发性、模仿性、依赖性、断裂性五个方面的特点，这就从源头上揭示了中国教育学发生的规律，进而为准确定位中国教育学在世界教育史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位置提供了依据。

第二，在中国教育史的初建阶段（1927—1949 年），主要围绕处理教育学发展与中西文化、教育学与师范教育发展、教育学的“学”与“术”、教育学理论与教育实践、教育学分化与综合五个方面的关系，中国教育学在“教育学独立成一门学科”“教育学的分类”“教育系科的设置和发展”“教育学类课程体系的构建”“教育学著作和教材的编写与出版”“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建设”六大领域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初步形成了中国教育史的学科体系。

第三，在中国教育史的重建阶段（1949—1966 年），主要体现为对旧中国教育史的改造（1949—1951 年）、学习苏联教育学（1952—1956 年）、教育学中国化的探索（1957—1966 年）三个方面，并着重从“如何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如何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如何重视和加强教育研究”“如何适应世界教育史发展趋势”“如何进行教育学中国化”“如何突破普通研究的藩篱，全面推开”六个方面的基本问题，来反思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建设和发展的历史启示。

第四，在中国教育史的挫折阶段（1966—1976 年），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教育学重建的成就被全

盘否定，中国教育学遭到了严重破坏，要立足“四个必须”来对其教训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总结，“必须正确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必须确立起学科的专业独立意识”“必须处理好批判和继承的关系”“必须全面审视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中国教育学的重建”。

第五，在中国教育学的重建阶段（1976—2000年），以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中国教育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并形成了“以中国式教育学为目标（1976—1981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为目标（1982—1984年）”“以中国教育学本土化为目标（1985—2000年）”重建中国教育学的阶段性特征。纵观20世纪中国教育学的发展历程，侯怀银认为，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教育学仍处于重建之中，更加需要结合中国教育学重建的目标、基本立场和基本原则等问题展开思索。中国教育学重建的目标就是要建设“中国教育学”，具体而言就是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教育学”。中国教育学重建的基本立场是“接着讲”，就是要接着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传统讲，接着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教育学传统讲，接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学传统讲，接着改革开放后以西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为范式的中国教育学传统讲。为此就需要做好“全面地认识中国教育学本质”“系统开展中国教育学史研究”“直面全球的前沿性教育问题”三个方面的前提性工作。中国教育学重建的基本原则为：整体性原则、实践性原则、开放性原则、独立性原则、民族性原则和自主性原则。同样，立足20世纪中国教育学史而放眼未来中国教育学的建设，正是《20世纪中国教育学史》一书的用意所在。该书不仅对中国教育学百年成就进行审视，而且对未来中国教育学的发展试图提供有意义的历史启示和思想资源，以推进未来中国教育学的发展。^①

总而言之，在中国教育学领域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之际，侯怀银申请并获批了国家社科基金“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教育学重大课题“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发展与创新研究”，这既是对中国教育学界教育学研究前沿方向的引领以及对建设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推动，又是以“20世纪中国教育学史”的系列研究成果为基础，进一步拓展和延伸中国教育学史研究领域的新行动。《20世纪中国教育学史》一书的出版，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建设的轴心点上，这就是该书之于中国教育学科的价值所在。

（责任编辑 曹周天）

^① 侯怀银. 20世纪中国教育学史 [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前言5.